

# 華僑史



晉江地區華僑歷史學會籌備組編

第2輯  
1983.7.

# 华侨史

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

一九八三年七月

封面设计：黄芦生

摄影：杨湘贤

## 《华侨史》 第二卷

|       |             |
|-------|-------------|
| 编 辑 者 | 晋江地区侨务办公室   |
| 通 讯 处 | 晋江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
| 印 刷 者 | 泉州市华侨大厦     |
| 出版日期  | 晋江地区印刷厂     |
|       | 一九八三年七月     |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已故爱国侨领洪骏声同志的儿子洪惠南昆仲，献出家里珍藏三十多年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手迹各一幅，委托晋江地区侨联会送交北京革命博物馆。

周恩来总理手迹原件宽26公分、长64.5公分，全文是：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

录沈钧儒先生感事诗 周恩来

生经百战饮倭头，  
不净胡尘剑不收，  
鸭绿江边期啸傲，  
何须九世报斯仇。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

朱德委员长手迹原件宽32.5公分、长64.5公分，全文是：

生经百战饮倭头，  
不净胡尘剑不收，  
鸭绿江边期啸傲，  
何须九世报斯仇。

朱 德



美籍华人学者麦礼谦先生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来  
 泉访问。图为麦先生在泉州海交馆讲演美洲华侨史。



菲律宾菲华联谊会理事长、《世界日报》总编辑吴永  
 源博士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回国观光，应晋江地区  
 侨联、侨史研究会筹备组邀请，举办菲律宾华侨历史概况  
 讲座。图为吴永源博士讲演情况。

# 《华侨史》

---

## · 论 文 ·

- 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陈碧笙（1）  
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华侨……………陈允敦（22）
- 

## · 地 方 史 料 ·

- 泉州华侨史料拾零……………陈泗东（37）  
泉州华侨历史略论……………童家洲（47）  
德化县华侨简史……………徐本章、陈仲伦（62）  
晋江地区华侨史料拾掇（二）……………蔡力哲（76）
- 

## · 回 忆 录 ·

### 英勇奋战在吕宋岛上

——记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 ……………《福建侨乡报》记者（124）  
我是吕宋客……………赵祖培（135）  
回忆怡朗华侨的爱国行动……………高作楫（140）  
缅甸曼德礼侨团与侨务活动概况……………林 竹（149）
-

## 第二辑 目 录

---

### · 人 物 传 记 ·

#### 平凡的一生 卓越的贡献

##### ——记黄怡瓶先生

.....南安华侨中学(162)

菲律宾国父黎刹.....鲁阳戈(169)

旅菲华侨刘亨贻先生光辉史迹.....洪成宗(173)

#### 中菲人民的战斗友谊

##### ——菲律宾独立战争的华侨将军刘亨贻

.....郑炳山(178)

#### 菲律宾《世界日报》撰文“纪念刘亨贻诞辰

110周年”.....泰 强(186)

---

### · 侨 乡 建 设 ·

#### 近代晋江地区华侨的国内投资

.....林金枝(187)

#### 晋江县华侨捐资办学情况调查

.....陈德珍(224)

#### 晋江华侨中学简史

.....李贤起(231)

---

# 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陈 碧 笙

## （一）华侨史分期的主要依据问题

华侨是由中国迁出去的，又长期居住国外。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祖国和来自所在国的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华侨史的分期应该以何方为主要依据的问题，应该以祖国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为主要的依据呢？还是应该以所在国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为主要的依据？就迄今为止的历史看，我以为应该以祖国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为主要的依据。理由如次：

（1）历代华侨都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中华民族是华侨产生的唯一母体，它发展到什么阶段才会有大量人口移居海外，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的条件，所在国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2）由于长期以来祖国与所在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始终存在有巨大的差距，华侨出国并不是短时间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自南宋以来的七八百年间，一直绵亘不断地在发生，其数量愈来愈大，后一期总比前一期多，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我们还能看到第一代的华侨。这就使祖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能够继续对海外华侨社会保持强大的影响。

（3）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国家，许多华侨都怀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绪，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稍有积累，就想迁回祖国，即使

不能回国，也要汇款赡养家属，或捐资兴办家乡公益事业，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

(4) 华侨在到达东南亚之后，往往会因为生存上的需要而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华人社会，不易为他族所同化。西方殖民者和当地统治阶级所采取的种种歧视、限制、排斥措施，适足以激起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团结的加强，从而更少有受到当地社会影响的机会。

(5) 绝大多数华侨居住城市，从事生产劳动和工商业经营，不能充当军人、警察或官吏，也不能参加稻作生产，所有阶级分化几乎限于华侨社会内部。这种按照民族界线而形成的职业上的分工，也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华侨与当地人民间的接触与融合。

(6) 东南亚各国历史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越南早在秦汉之际就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暹罗迟到十三世纪中叶才有封建制国家的建立，有些地区直到近代保留有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如以所在国的历史社会条件为依据，不易找出一个共同的合适的标准。

由上几点，我以为华侨史的分期应该以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为主要的依据，同时也把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考虑在内。这当然是指迄今为止的华侨历史而言。今后如果祖国对华侨的联系和影响日益削弱，长期不再出现第一代的华侨，那自然又当别论了。

## (二) 华侨史分期的标准问题

就目前所见到的华侨史著作看，华侨史分期的标准大概有如下几种：

(1) 以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为分期的标准。如刘继宣

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就把南洋华侨史分为：①隋以前南洋之归化；②唐代与南洋之关系；③宋代之有南洋经营；④元代之南洋拓殖；⑤明代之南洋拓殖和⑥列强瓜分南洋中之华侨等六个时期。有的著作则干脆按照朝代顺序区分为唐代之华侨、宋代之华侨、元代之华侨、明代之华侨、清代之华侨和民国时代之华侨等等。这种分期法与旧史的分期完全一致，有其简便易懂之处，缺点在于纯粹以封建王朝体系为依据，看不出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在华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2）以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关系为分期的标准。如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就把华侨史分为：①中国殖民之初期；②中国势力时代；③中西势力接触时代和④欧人势力时代等四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把华侨的产生和发展看作中国封建王朝和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产物，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且表现出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是不足取的。

（3）以中国对东南亚的交通贸易为分期的标准。如成田节男《华侨史》分为：①南洋交通的黎明时期；②唐代南洋交通时期；③市舶司贸易时期（宋元）；④走私贸易时期（明清）；⑤苦力贸易时期（鸦片战争以后）；⑥民国革命与华侨和⑦二十世纪华侨激增时期等七个时期。这种分期法已注意到中南交通贸易在华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所考察论述多限于表面现象，未能深入探讨问题的本质。

以上三种分期都是旧历史学家根据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提出来的。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相信：“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

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求变更之中。”<sup>①</sup>因此,华侨史的分期只能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标准,而不能有别的什么标准。有些同志主张,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些英雄人物的重要活动,如郑和下西洋和元代的南海经营等都可以作为华侨史分期的标准。然而,不论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好,或者是英雄人物的重要活动也好,归根结底总是要为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所决定的。而就历史事实说,郑和下西洋固然不失为中外交通史上一件大事,对于中南关系的开展和华侨祖国观念的提高也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这件事是封建帝王出于好大喜功和追求奇珍异物的需要而发动的,尽管也兼营一些贸易,但始终没有越出官商垄断的范围,而且耗费不赀,得不偿失,久即无以为继,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大量华侨出国的现象。相反,明永乐三年(1405)第一次下西洋路过苏门答腊旧港时,还曾发兵击杀所谓陈祖义“贼党五千余人”<sup>②</sup>,是否可以看作封建王朝对海外华侨的一次大规模的镇压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当地华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未始不值得研究。元初多次对东南亚各国用兵(三次进攻占城安南,两次进攻缅甸,一次进攻爪哇,又一次进攻八百媳妇),对整个东南亚局势无疑曾发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但并没有直接导致华侨的大量增加。元代版图已与缅甸、暹罗、老挝、安南接壤相接,而六七百年来由陆地移入东南亚的华侨却为数极

---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61页。

②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52,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

微，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云南广西边境的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不得不大量移出人口的程度。由此可见，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分期的标准，应该更接近于历史事实，也更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 （三）华侨史的上限问题

关于华侨史的上限起自何时，目前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最早的一种看法认为，由于古代民族的移动性很大，自秦汉之际汉民族形式开始，就可能有人移居海外，而成为最早的华侨。这种看法纯出揣测，既无文献可以证明，在事理上也说不通。汉民族以农耕为业，安土重迁，不象原始人群或游牧民族那样的迁徙靡常。秦汉之际，汉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广大的南部和东部沿海尚未开发，自然谈不上移居海外了。

次一种看法是，自中国与南海各国发生交通贸易开始就应该有华侨，并引《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自武帝以来（前140—87）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史料为证。华侨的出现固然与海上贸易交通的发达有关，但并不等于说，一有海上贸易交通就必然有华侨。《汉书·地理志》所记属于“黄门”的“译长”和“应募者”，都是受当时宫廷派遣而冒险入海的，目的在于获得海外奇珍异物，若干年仅能来往一次，留居海外的可能性是极微的。

又一种意见引用《梁书·王僧孺传》“关于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物，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的记载，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可能出现了华侨。可是，《梁书》所记的对外贸易活动，一方是“外国贾

人”，另一方是中国州郡官吏，根本没有民间商人参加，又何从有华侨的出现呢？

还有一种意见根据《法显行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洋寄归内法传》诸书，认为晋唐诸代取道南海前往印度取经的僧徒是最早的华侨。我们知道，这些僧徒航经南海都是路过性质，有如后代的游客或旅行家，即使偶然有人留居下来，由于僧徒不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也不会繁衍成为后代那样的华侨社会的。

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华侨史的上限应断自唐代开始，因为：第一、海外华侨皆自称为唐人；第二、唐代南海交通贸易空前发达，蕃商蕃舶接踵而至，政府设蕃舶使专理其事；第三、中外史籍如杜环《经行记》①、《通考》咀罗斯城条②、马素地（Abu-l-Hasan ali Elmasudi）《黄金牧地》（Les prai'ers d'or）等书都说在大食、阿剌伯、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可以见到移居海外的华人。关于第一点，朱彧《萍洲可谈》谓“蛮夷呼中国为唐”③；《明史·真腊传》亦云：“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凡海外诸国皆然”；是“唐人”原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后中国人亦用以自称，如近代的唐山与唐人街，这都是唐代以后的事，不能理解为唐代中国人已自称为唐人，更不足以证明唐代已经有大量华人移居海外。关于第二点，当时载籍如《新旧唐

---

①② 杜环《经行记》所记在大食国“作画”和“织络”的“汉匠”，疑系奉封建朝廷派遣出国的；《通考》咀罗斯条明言“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都与后代出国谋生的华侨有明显的差别。

③ 《萍洲可谈》谓“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其实，唐威令之行于西北且远过于东南，“唐人”之称很可能就是西北大食、阿剌伯诸国叫起来的。

书》、《全唐文》、《唐会要》、《资治通鉴》、《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切经音义》、《国史补》诸书所说的“蕃商”，都是指大食商人或阿剌伯商人，而非华商；所说的“蕃舶”都是指南海舶、西南夷舶、波斯舶、波罗门舶、崑仑蛮舶、南蕃海舶、师子国舶而非华舶。在航海和贸易为外国商人支配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和水手很少有大量迁居海外的机会。关于第三点，即令《黄金牧地》诸书所记完全可信，至多仅能说明有人为了避难被俘或奉派而移居国外，人数既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各地普遍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古代华侨出国的先驱，但还不能据以断定华侨史时代已经开始了。正如我们可以把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出现但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先驱，但还不能据以断定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开始了。

我认为，华侨史的上限应该断自华侨出国已经成为历史上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的时候开始。而这种现象只有在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封建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之后有可能出现，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 （1）、沿海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激增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急剧增加，并日益超过北方，福建人口的增加尤其迅速。三国吴时，晋安郡仅有八县，4,300户<sup>①</sup>；隋时为建安郡，凡四县，12,420户<sup>②</sup>；唐时福州长乐郡有十县，34,084户，75,876口；建州建安郡五县22,770户，142,774口；泉州清源郡四县，23,806户，160,245口；汀州临汀郡二县，4,680户，17,940口；漳州漳浦郡二县，5,846户，17,940口；合计共约九万户，四十万

① 《晋江·地理志》

② 《隋书·地理志》

口<sup>①</sup>，比隋代增长了七八倍；但福州、漳州两大平原及其周围的人口仅为闽北山区建安郡的53%至4.1%，足证其尚未开发。宋代福建人口进一步急剧增加，共有1,062,109户，比唐代增十一倍多，比同时代面积大三分之一的广东（共311,563户）也超过三倍，其中属于闽西北山区的建宁府建安郡七县，196,566户；南剑州剑浦郡五县，119,541户；汀州临汀郡五县，81,454户；邵武郡四县，87,594户；属于闽东南沿海的福州长乐郡十二县，211,552户，比唐代增六倍多；泉州清源郡七县，201,406户，增八倍多；漳州漳浦郡四县，100,469户，比唐代超出十八九倍；此外还有兴化郡三县，63,157户，也可看作新增加的沿海人口，还有与漳州毗邻的广东潮州潮阳郡也自唐代的4,400户增至宋代的74,682户，增十八九倍<sup>②</sup>。《宋史·地理志》说：福建“土地迫陋，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遍，亩值寝贵，故多田讼。”由于地少人多，许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种的人们不得不抛乡别井，飘海过番谋生，这是大量华侨出国的根本原因。

## （2）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发展

由于水利的兴修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如围田、塍田、涂田、沙田、梯田），农产物产量倍增，且日益专门化。除有大量粮食远销各地外，经济作物如丝、棉、苧麻、茶叶和水果的栽培也相当普遍。手工业生产较重要者有采矿、冶铸、染织<sup>③</sup>、陶瓷、造纸、文具、酿造等业，其制作之精美与规模

① 《新唐书·地理志》

② 均见《宋史·地理志》

③ 染织业出现了开始与原料生产相分离的专业性的“织户”，即所谓“织帛之家。”

之巨大均迈越前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导致了交换工具的革新，因而出现了银两和纸币（“交钞”），后者的使用比欧洲早几百年。由于有大量商品可供输出，对外贸易日趋繁荣，市舶贸易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温州和密州都是当时的著名贸易港，泉州且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

### （3）阶级结构的变动

随着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统治阶级的结构和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唐代的世族门阀开始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代以各种品级的官僚地主。士大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世代为官者为数不多，一般是三世而衰，所享有的特权也日趋减少。在被统治的人民方面，随着土地买卖的盛行和私有制的抬头，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部曲已不复存在，客户转化为佃农，视同“齐民”。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兵匠、雇匠、差雇匠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提高。官奴婢和籍没罪犯及其家属入官为奴的制度亦宣告废止。劳役地租日益让位于实物地租，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徭役制代以雇募制。唐以前的都制和市制也开始废弛，宵禁有所缓和，市以外亦可进行贸易，商工活动颇为自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象“行”、“作”那样的自治性的行会。商人力量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使他们能够和蕃商平起平坐，开展竞争，进而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海外去。

### （4）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代学术繁荣远远超越前代，天文、地理、历史、考古、文物、制度诸学科都有许多重要著作行世，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发明。在此影响下，造船航海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当时大号船舶可载数百人至千人，

侧面用双重船板，船底用三重，船内划为数区，界以严壁，庶一部有损，不致危及全体。桑原隲藏说：“十一二世纪之交，华船已用罗盘，较地中海阿剌伯海船舶之用罗盘，为时独先。”<sup>①</sup>又说：华船“自法显后，代有进步，载量日增，设备日周，航术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极。自法显义净始，经六朝而至隋唐，往天竺之僧概乘外船；七八百年后，奥道力克、伊本巴都他、马哥孛罗等外人，往来华印之间，多乘华船，其故可想也。”<sup>②</sup>在航海方面，除了传统的南海航路（亦称西洋航路）外，中国水手又开辟了通向菲律宾、婆罗洲诸岛的东洋航路。华船取代蕃舶，中国商贩和水手的足迹遍及南洋群岛各地，也为华侨大量出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上述有关华侨出国的四大因素：沿海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激增，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阶级结构的变动和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皆未见于唐代，而始见于宋代，所以华侨史的上限应该断自宋代开始。

#### （四）华侨史的四个时期

根据上述，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据，结合考虑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初步设想把华侨史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十二世纪初叶（南宋建炎元年）沿海商品经济急剧发展开始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明隆庆崇祯阳）明代海禁开放，前后约四五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封建经济高涨时期，在华侨史上是华侨开始大量出现和广泛分布时期，其特点约如下述：

（1）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发达和南方土地的大量

---

①② 桑原隲藏《蒲寿庚考》第二章，第99页。